

福建经济发展简史

厦门大学出版社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 编著



福建省“六·五”社科重点项目

福建经济发展简史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编著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室

●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闽北印刷厂排版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11.875印张 6插页 264千字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5615—0128—5

K·12 定价：4.50元

承蒙傅衣凌教授、韩国磐教授支持并指导本书的编著。

郑学檬主持本书的编著工作，并负责总纂，

杨际平、陈支平协助总纂

各章节撰写者名单：

代 序	郑学檬		
第一章	魏洪沼	戴一峰	林汀水
第二章	杨国桢	杨际平	郑振满
第三章	徐晓望	陈衍德	张文绮
第四章	郑志章	陈 铨	
第五章	林仁川		

(李少泳同志提供了近代公路交通史料)

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的若干问题

(代序)

郑学檬

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集体编著的《福建经济发展简史》一书，终于完稿付梓了。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我曾和同志们就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中的若干问题交换过意见，现不揣浅陋，把它写出来权作本书的序。

我想阐述的问题有三个：第一，福建历史上经济较为发达时期是怎样出现的？有些什么历史经验？第二，福建历史上造成经济停滞的诸因素是什么？第三，中国经济史研究如何为当前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发展生产力服务？当然，以上三个问题要讲清楚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在长期研究之后才有可能。所以下面所陈各点仅仅是我们在分析了一些基本资料以后的探索性的意见。

福建先民的活动，已由闽侯、福清、光泽、武平等县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展示出来。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蚌器及墓葬，说明在闽江流域、在武夷山谷地、在沿海丘陵地带，我们的

先民，曾度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时代。

至少在战国，福建先民活动的信息已传到北方。成书于战国的《周礼·职方氏》已有“七闽”的记载。秦统一中国，置闽中郡，治所在冶县（今福州市），所辖范围除今福建省以外，还包括浙江宁海以下沿海地区。闽中郡的设立虽然并不表明福建已进入与中原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但确实标志着福建先民的经济活动从此和中原有了较多的联系。

汉高祖立无诸为闽越王，令其治闽。至汉武帝时，以闽越僻外，诏迁其民于江淮，以虚其地。但这只是暂时现象。不久，逃避迁徙的人即返回，继续开发福建的部分地区。汉代是福建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从崇安汉城遗址发掘出来的一批铁器便可证明。铁器生产工具加上汉代货币的出土，足以证明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货币已流入福建，这必然促进福建地区逐步摆脱孤立状态，向封建社会转化。

福建封建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比较早就体现了致力于开发山海的特点。福建山区面积占全省面积的75%，山区也是福建经济的摇篮。我们知道，福建的先民闽越族人数比较少，他们是开发福建的先驱者，但是比较大规模的开发则是在东汉末年一部分汉族移民入闽之后。汉族移民有较丰富的生产经验，带着中原的先进技术、工具，从闽江上游山区进入福建定居，闽北山区就成为封建时代福建的第一个开发区。三国吴置建安郡，郡治即在建安县（今建瓯），说明闽北山区是当时福建的经济稍为发达地区。

由于福建面海，我们的先民很早就利用海上交通和海上资源发展经济。经过汉代数百年的探索实践，福建沿海开发也日有进展。除了农业生产活动外，主要表现在海上交通及鱼盐之利上。东汉时即有以东冶（今福州市）为通往交趾的主要港口的记载。

“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①。交趾是汉武帝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

三国时，沿海航海活动终点也是交州、夷洲等地。许靖从会稽沿海岸航行交州，卫温率舰队到夷洲（台湾）是两次壮举。魏晋时候，侯官（今福州市）及其他沿海的海上交通活动已经比较频繁了，这一方面和三国以来在温麻（今连江县）设有典船校尉主持的船屯有关^②。另一方面也和沿海经济交流发展有关。如南朝侯官陈宝应利用由海道寇略浙东等地的机会，“载米粟与之贸易，由是大致资产，士众疆盛”。^③这是福建粮食运销浙江的第一次记载，说明经济交往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反之亦然。

隋唐时期，社会相对安定，福建的开发自必有较大成绩。以山区农林矿业和沿海鱼盐贸易为特色的福建经济一直沿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前进。但是，和江南其他地区比较，福建仍属不发达地区。开元年间福建的福、建、泉、漳、汀五州之地仅有9万余户、41万余人口，只比苏州或杭州一州的人口稍多（苏州6.8万余户，后来号称10万户；杭州8.4万多户）；农业、手工业生产水平还不高。

唐后期至五代，福建的开发加速了。到了两宋时期，福建的

① 《后汉书》卷六三《郑弘传》

② 典船校尉为吴国主持造船的长官。晋太康四年（283）又于温麻船屯立县。

③ 《福建通纪》卷一。

经济已进入江南先进地区行列。明清两代，福建经济继续繁荣。为什么五代两宋以及明中叶至清初，福建的经济会有较大的发展？归纳起来说，有下列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山区开发的加速。福建在唐开元以后至五代的200年左右的时间内，由于北方移民人口的增加和原来人口的自然增长，劳动力严重缺乏的状况有所改善。一些山谷地区因此得到开垦，形成居民点，继而设场收税，进而置县管理。从《太平寰宇记》等记载看，唐玄宗到北宋太祖时，福建置县20个，仅次于江西（27县）；其中五代时置县12个，它们是罗源、宁德、闽清、剑浦、建宁、顺昌、归化、同安、德化、永春、清溪、长泰，除同安外，其余都属山区，闽东3县，闽北3县，闽西1县，闽中南5县。以上各县设置的原因，大至相同，举清溪县（今安溪县）为例，该地原叫小溪场，属闽南山区，为泉州一镇，“地广二百余里，……土之所宜者桑麻谷粟，地之所产者獐麋禽鱼，民乐耕蚕，冶有银铁，税有竹之征”^①，因而富饶，遂有置县之议。可见，设置山区新县，是山区经济开发的结果。

入宋以后，山区经济发展的势头更足了。根据一些典型资料统计，两宋福建人口增长率是很高的，这在本书有关章节中将述及。

每平方公里平均人口数的增长速度也高于两浙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这三路割境相当于今浙江、苏南、江西）。在人口增长（即意味着劳动力增长）中，值得注意的是山区人口的增长。北宋的六州二军，从北宋初到元丰初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是漳州（增长418.5%），第二为汀州（增长339%）

^① 《重纂福建通志》卷二《沿革》注引詹敦仁《记》。

第三为福州(增长22.4%),第四为南剑州(增长21.1%),第五为泉州(增长20.8.5%),第六为建州(增长20.6%),第七为邵武军(增长18.3%),第八为兴化军(增长16.4%)。因为六州二军辖境大部分是山区,可以认为山区人口的增长较快。当然,沿海各邑亦有人稠之称。人口增长带来了山区开发的新的活力,使山区的经济有长足的发展。如南剑州、建州、邵武军所在的闽北山区,劳动力充足,“垦山陇为田”^①,兴修水利,种植水稻。到明末清初,山田山地开垦叹为观止,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福建》引《漳浦志》云,漳浦县的深山中,“颠崖皆开垦种艺,地无旷土,人无遗力”。

山区的开发有利于农业生产结构的改变。山区自然资源丰富,茶、漆、竹、木、果、药材、菌类,无所不有,农民可以在粮食生产之余发展山区经济作物和采集经济,增加收入。山区经济作物首推茶叶。宋人认为,茶之“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②,产茶之地遍布福州、南剑州、建州、邵武军、漳州、汀州,主要在这些州军的山区丘陵,以建州的龙凤团茶最著名。林业已从砍伐自然林转为有计划栽种杉、松等民用材林。宋时建州、罗源、宁德、连江、兴化等县山区,就是用材林生产地。淳熙初建宁有个吏部尚书韩元吉,曾栽种大片松林^③,就是人工营造松树林的一个例子。经济林方面还应提到桐树。据赵汝砺:《北苑别录》的记载,茶树夏则喜阴,秋则畏寒,闽北建州即于茶园套种桐树,为茶树遮阳保温,使其阴阳相济,各得其利。这是利用不同作物的

① 方勺:《泊宅编》卷三。

② 黄裳:《演山集》卷四六《茶法》。

③ 《建宁府志》卷二〇。

生长特性，套种不同科属树木的成功经验。所以桐树在闽北有较大的发展，为桐油生产提供了条件。至于水果、药材、食用菌的栽培、采集、出售也散见在山区的农村。

明清福建山区经济显得更加活跃。首先，粮食（主要是水稻）生产有进一步发展。山区“万壑有泉皆稻熟”。浦城、建甌、光泽、建宁是本省有影响的水稻生产地。明代福州所需之粮食即部分依赖上述闽北各县供应。粮食外运，刺激了水稻生产技术的改进。明清时建阳等地已实行水稻连作；水稻育种也取得成绩。仅据《闽产录异》的统计，建宁县水稻品种有早稻“六十日黏”等12种，晚稻“犁木赤”等11种；崇安水稻品种有早稻“粳早”等15种，晚稻“鸬鹚斑”等17种。长泰等地还移植“山东早”，建宁、浦城、尤溪、政和、建阳、南平等县也移植“江西早”，福州等沿海县份及建阳、连城继续种占城稻。使外地水稻良种在福建山区推广。

其次，明清时期福建山区经济作物的栽培，比宋元更为发展，我想略举数例予以说明。茶的栽培继续遍布山区。明前期建州茶叶生产下降，中期开始回升。武夷山茶的种植有所发展，万历年间武夷山九曲一带有数百家茶农，年产茶几十万斤。泉州清源茶与武夷茶齐名，为明代名茶之一。清代因对外贸易的发展，福建茶叶发展迅速，道光十八年（1838）武夷山茶的产量跃进至数千万斤。

油茶的种植也是山区一大经济收益。王世懋的《闽部疏》记载说：“余始入建安，见山麓间多种茶而稍高大，枝杆槎枿，不类吴中产，问之始知为油茶，……已历汀、延、邵，愈益弥被山谷”，“其实为油，可灯、可膏、可釜，闽人大都用之，然独汀之连城为第一”。

再则为竹木之产。《闽大记·食货考》记载“杉木出上府（指上三府建宁、邵武和延平），集于（福州之）洪塘”，“竹类甚夥。……然阻岭峤，不能致远也”。将乐县毛竹捆载船运至福州①。竹木之产地有水运条件者，采伐营利自无问题，但多数地区则因为山岭阻隔，运不出去，无法形成商品生产。

蓝靛也是山区一大出产，宋应星《天工开物》称“闽人种山皆种蓝，其数倍于诸蓝”。另一种染料姜黄出邵武，“客商多贩往汴梁、南京，以供染及诸香作线香”②。

此外，据何乔远《闽书·风俗志》所载，长乐“山出果实，贩四方，有离支（荔枝）尤目（眼）、青李之品”；泉州“附山之民垦辟硗确，植蔗煮糖”；德化山区种麻苧，又有山木之饶；永春有“山林陂池苑囿之利，杉木之饶”；建阳茶苧之外，还有梨的出产；将乐、建宁也产苧麻；尤溪则有蜂蜜及“菇笋之脯”（香菇和笋干）；建宁还产漆；长寿之山，并有佳葛。王世懋《闽部疏》也指出：“闽山所产，松杉而外，有竹、茶、乌白之饶”。以上记载说明，福建的山区，自然条件优越，可以生产许多经济作物。福建人民正是利用这个条件，变山区为宝地，开发山区，靠山、吃山、用山，丰富了福建社会经济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阐述福建两个经济发展期（两宋、明清）后的第一点认识，即福建历史上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是山区的开发，这里还暂时不考虑矿冶、制瓷等手工业，仅就粮食和经济作物的发展为例，说明什么时候山区的农业（包括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

① 《将乐县志·土产》。

② 天启《邵武府志》卷九。

物、副业)发展了,那么福建也就富起来了。原因很简单,福建大部分属山区,山区的粮食可以支援沿海城市,促进商品经济发展;山区的土特产可以为发展手工业如制茶、麻织、造纸榨油、染料、生漆、酿蜜、板材等生产提供原料。山区的手工业原料和成品,还是出口外省的重要商品,如福建之蓝,“利布四方,谓之福青”^①福建之姜黄,贩销开封、南京,福之烟叶“吸之可醉,号曰干酒”^②,运销关外。此种烟叶,也在闽西及沿海各县种植。福建之杉木海运江淮地区。本书述及省内上三府(建宁、邵武、延平)和下四府(沿海各地)贸易,上三府输出商品,一以粮食为大宗,二是竹、木、茶、纸、酒等产品为大宗。

因此,山区是福建的聚宝盆,山区经济一旦活跃起来,福建经济就充满活力。

第二,海上贸易的繁荣和鱼盐之利,是福建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重要因素。

福建海上贸易的发达是由其所处之地理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世界的海上贸易,最早发生在地中海东部、红海和波斯湾。原因是地中海沿岸、阿拉伯北部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同时地中海是比较平静的内海。地中海的航海事业具有下列特点:以内海贸易为主;海上交通有明显的经济活动性质;有贸易对手。

中国古代的情况稍有不同。中国古代是以农业民族为基本力量,活动范围为黄河中下游,因此农业构成社会经济基础,商业只是在农业、手工业发展基础上才开始缓慢地出现。秦汉以后,海上航运才开始。主要是沿海的航行。三国时期,内河航运因战

① 《八闽通志》卷一一。

② 叶梦珠:《闽世编》卷七。

争和经济交换而发展起来,造船业勃兴,为转向海上航运打下基础。真正的海上航运的发展是和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开发联系在一起。因为南方的开发,必然引起沿海各地区经济上互通有无的要求,所以,海上交通应运而起。当时,与中国南部沿海相邻国家的经济很不发达。日本在3——5世纪,还处于奴隶制初期的邪马台国和大和国时期,那时虽和中国发生了联系(曹魏时和刘宋时均派来使者),但谈不上有经济交流的可能,印支半岛的林邑(今越南中部)有一些交往,但没有发展大规模贸易的可能。虽然印度笈多王国的城市和贸易也很繁荣,它和中国也有海上联系,但因中国南部海域风大浪高,非地中海可比,所以,三至五世纪仍然没有条件发展大规模的中国南部沿海和印度笈多王朝的海上贸易关系。因此,中国缺乏近邻海上贸易对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具体历史特点、地理环境决定它不是一个早期航海国家,这一点也反映在福建的海上贸易活动中。但是,福建本身由于高山阻隔,地处远离中原的海疆,当它进入大规模开发之后,自然会从海上寻求贸易,故相对来说,有比较迫切的向海上开拓的要求,从而推动它的航海事业的发展。并且在宋元时由沿海贸易为主转向以远洋海上贸易为主。

宋元福建经济高涨时期,即以活跃的海上贸易的发展为其特色,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设市舶司于泉州,徽宗时又于泉州置来远驿。南宋时泉州已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和政治、文化交往关系,它们是三佛齐(苏门答腊)、占城(越南中南部)、真腊(柬埔寨)、渤泥(文莱)、蒲甘(缅甸中部)新条、三泊、绿洋、麻辣(印度马拉巴尔海岸)、嘉令、大食(阿拉伯)、西棚、木力千、新州、明丰、佛罗安、摩逐、三歧(吕宋西南,今菲律宾)、波斯兰、高丽(指朝鲜半岛)、故临

(印度西南沿岸之奎隆一带)、勿斯里(埃及)、细兰(斯里兰卡)、白达(伊拉克巴格达, 又称黑衣大道)、瓮蛮(阿曼)、注辇(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麻嘉(麦加)、层拔(东非索马里以南一带)、大秦(东罗马帝国)、天竺(印度)、新罗(指朝鲜半岛)等。泉州港几度繁荣, “风樯鳞集, 舶计骤增”, 闻名世界。至元代, 号称“世界最大之港”。

我们认为, 元代泉州港的繁荣, 对外贸易的发展, 是基于福建经济的发展。福建沿海地区的开发, 自五代以来即卓有成绩。一是农业的发达。福州地区经王审知时代开发经营, 农业生产有醒目的发展, 至宋代号称膏腴沃土。晋江流域, 五代末泉州附郭堤上堤下, “种稻三千顷, 插柳百余株”。膏腴良田, 广种稻谷。沿海乡村筑堤挡潮, “变斥卤为膏壤”。九龙江畔的漳州, 自宋以后, 生齿日繁, 过去的荒丘莽地, 悉皆垦辟, 纵目一览, “白水青秧纵横, 远近布棋局, 平原旷野参差, 高下叠龙鳞”。①

沿海的人口集中, 人口的增长率也高, 人口的增长为沿海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增加了人力资源, 对于生产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是有利的。当然, 人口增长也使耕地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 这也是使部分劳动力向海上贸易及渔业转移的一个原因。

二是手工业发达。沿海制盐业在唐时已有所发展, 闽县、长乐、连江、长溪、晋江、南安均有官盐盐场的分布, 宋代长溪、罗源、长乐、福清、莆田、惠安、晋江、同安、尤溪、漳浦十县产盐较多。北宋时福建年产盐1100万斤, 南宋时增至2656万斤。宋代福建的纺织业主要分布在沿海各县。泉州出产丝织品可以和蜀吴之产相媲美。1975年福建南宋黄升墓出土的两匹有

① 《漳州府志》卷四二《艺文·鸿江赋》

泉州宗正司记号的金丝绢，证明泉州当时已有高超的丝织技术。此外，泉州还是棉布业的发源地，所产木棉布是宋代贡品之一。元时福建和浙东、江东、江西、湖广一起设置木棉提举司，贡输棉布，促进了福建沿海棉织业的发达。

沿海制瓷业首推泉州之碗窑、磁灶，生产青瓷，以供出口，当然其质量、数量还不能和山区德化宋窑之白瓷相比。

造船业是沿海各地主要的手工业部门。宋人说：“海舟以福建为上”。1974年泉州湾后渚港出土的南宋古船（一艘中等远洋帆船），尖底，三重壳板，多根桅杆，隔舱数多，具有结构坚固，抗风力强，吃水深，稳性好的特点。

总之，宋代福建沿海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为海上贸易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资条件。粮食、蔬菜、水果供应泉州、福州等城市官民商行、蕃客的需要，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出口物资，造船业则成为海上贸易发展的保证。海上贸易的发展不是偶然出现的，是沿海经济发达，东西方经济交流的产物，天时、地利、物丰、人勤，使之必然而盛。

明清福建海上贸易虽不及宋元时期声势之大，然亦足称道，并有性质上的变化。明初（1374年）在宁波、泉州设立市舶司，同年旋废，至永乐元年（1403）又复置。由于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比较保守，以严格控制为基本方针，又限于官方贸易。故泉州对外贸易难与昔比。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的发展，它反映了对外贸易的变化。本书论述明代福建私人海上贸易特点时概括地指出：私人海上贸易以追求高额利润为目的；私人海上贸易船主和舵工、梢工的关系是雇佣关系；所贩运的商品大部分是手工业原料、手工业品和日用物品。这些论点妥否，尚待学术界评论。

明清时代私人海上贸易的参加者人数众多，仅以赴吕宋贸易的福建商人为例，就多至数万人。这可能是笼统的统计，不很准确，但至少反映了参加人数之多的事实。贸易地区遍及南洋各地，远至东非、阿拉伯半岛。早期的海外贸易者多为小商，嘉靖（1522——1566）时逐渐形成许多私人海上贸易集团，有了一批著名的海商首领，他们当中以漳州月港张维等二十四“将”及明末郑氏集团为最显赫。进出口货物有几百种。《东西洋考》所记在漳州月港纳税的进口货物达110种，其中除大量统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外，还有一批民用日用品，如竹布、蕃藤席、交趾绢、水藤、槟榔、牛角、椰子、海菜、番泥瓶、棕竹之类。大米的输入至清代大量增加，乾隆二十一年（1755），仅一艘吕宋来厦门的夹板船，就载来米7700余石。出口货物也品种繁多，据日本学者的研究，从1637——1683年，平均每年输往日本的糖即达160多万斤。其中包括转运暹罗、广南等地出产的糖。1628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船只运往波斯的中国粉砂糖也多达3.64万余斤。瓷器亦属大宗出口货物，崇祯年间仅从福州外运至日本的瓷器即达2万多件，江西景德镇、浙江处州部分瓷器亦从福建出口。茶叶、纺织品、铁器、果品出口量也相当多，其它还有香、扇、梳、簪、毡、袜、纸等货物。

对比以上进出口货物，我们的印象是：直至明清之际，中国浙江、福建仍然作为先进的手工业生产地而闻名于世界，东南亚各国、日本、阿拉伯、欧洲均需要江浙、福建的手工业产品。顾炎武说，“盖海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是两夷也，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籍中国之丝到彼，……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者，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吕宋还欢迎中国的手工艺的传入，“佛

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器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①明人姚士麟《见只编》卷上则记载说：漳州之纱绢和湖丝、饶瓷、松江棉布一起为日本所需之物。

因此，明清时期福建对外贸易发展不仅以私人贸易为特点，而且还有着坚实的商品生产基础，而日本、吕宋、南亚各国又仰赖这些生产、生活资料的进口。对外贸易基于生产的发展。反之，进口大米又可以缓和福建沿海城乡粮食不足的压力，同时也促进沿海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人民的生活。

引进新的作物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番薯（甘薯）是明万历年间从吕宋引进来的。清人周亮工《闽小纪》详记其事：“万历中，闽人得之外国，瘠土砂砾之地，皆可以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近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周亮工指出闽人多通商吕宋，发现朱薯被野，润泽可食，故而引进，结果于饥荒大有裨益。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补充说，《长乐县志》称邑人陈振龙经商吕宋，带回薯种，后经其子经纶、巡抚金学曾等人相继推广，“岁大获，民赖之”。故番薯的引进对沿海粮食作物生产贡献极大，也是对外贸易的结果。

此外，花生也开始在福建种植。谢国桢先生《明清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上）指出《万历仙居县志》云“落花生原出福建”，大约明末由福建移种江南一带。而福建的花生（落花生），《物理小识》谓之番豆，可知也从海外传入。再则烟草，明人亦指出来自吕宋，“有人携漳州种之。”《东西洋考》还记载有椰子、槟榔、绿豆、红花米等。应该说，福建沿海沙土地地区分布广，不宜广种水稻，有了甘薯、花生，这些土地的利用率必然大大提高。

^①《天下郡国利病书》第二十六册，《福建》。

所以，我们可以说，明中叶以后福建沿海农业生产结构因甘薯和花生的引种而发生重大变化，此种变化又得助于对外贸易。

国外手工业生产技术，也有因通商而传入福建者，《天工开物》记载：“倭缎”织造技术从日本传入，“漳泉海滨效法为之”。即为一例。

上述分析说明，明清时期福建经济的发展是和海上贸易的繁荣分不开的。

鱼盐之利的开发，也在相当程度上支持了福建经济的繁荣。明清福建制盐业的一大进步是晒盐法的发明、推广和日益完善。因此福盐的产量大有提高。

福建的海上渔捞养殖业，在明清时期也有醒目发展。俗话说：“海者，闽人之田”。福、泉、漳三府沿海各地及海岛居民无不赖海上渔捞以为生计。《泉州府志》说：“濒海之邑，耕四渔六”，“鱼虾螺蛤多于羹稻，悬岛绝屿以网罟为耕耘”。福宁、福州、漳州诸府濒海之邑的情况亦是如此。可知渔捞业对于沿海人民生计，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福建海产资源极其丰富。明万历年间屠本峻所著《闽中海错疏》列举福建海域海产动物达二百余种之多。至于养殖业，沿海居民早在实际养殖活动中掌握了牡蛎、泥蚶、缢蛏、紫菜、海带的养殖技术。本书对以上情况专节叙述，可供读者参考。这说明福建人民早就利用濒海自然条件，靠海自养，丰富人们的经济生活，解决耕地不足的困难。福建人民决心开发海产资源的行动，有充分的历史根据。

第三，互通有无，繁荣城乡商业，是福建经济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这里，我想重点谈一谈福建历史上的城乡商业对弥补福建经济缺陷的作用问题，也就是商业如何促进福建经济发展问